

主编 柳建辉 李秀芝

(下部)



半个世纪
中国大事
本末



山东友谊出版社

CHINA

CHINA

下部

主编 / 柳建辉 李秀忠



CHINA



半个世纪
中国大事
本末



3 0314 8335 1

CHINA

下

部

CHINA

二十六、为了悲剧不再重演

众所周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上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像一股狂飚飓风，迅速席卷神州大地，并延续十年之久。其声势之大、历史之长、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共执政50年历史上十分罕见。正因如此，人们常常用“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巨大灾难”等名词来形容“文化大革命”；正因如此，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防止类似悲剧重演，就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大问题。

恩格斯曾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因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毛泽东也曾指出：“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这当然不是说，一个政党、一个民族越犯错误越好，而是强调总结教训的必要性。十年“文革”，把我们的失误、弊端和缺点都发展到极点，确实使我们从痛苦的经历中大彻大悟。可以说，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说：“对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

能在 80 年代和 70 年代末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邓小平谈“左”的失误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曾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如果说，我们总结的经验有很多条，那末，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段话言简意赅，是对建国后我们党一再犯“左”的错误的教训的深刻总结。建国后，党和毛泽东确实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犯了不少“左”的认识错误，并愈益发展，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主观上看包含着“破”与“立”的双重意向，以为通过“天下大乱，能够达到天下大治”。进一步说，从政治上，他是想探寻一条防止党变质国变色的道路；从经济上是要推行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构想的理想模式，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道路；从文化上是想造成纯洁的无产阶级的大众文化。由此看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本意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地，扫除资本主义势力，这是正确而富有远见的。但是，他对修正主义的含义没有作出科学的界定，以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造成了严重失误。作为一位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毛泽东经常关注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并且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的确十分可贵。问题在于，他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对党内政治状况和国内形势的估计错了。所谓党变质、国变色已经成为现实危险，并且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党内

有一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等等，都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臆断。长久以来，毛泽东以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利益的忠诚，不断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积极探寻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境界。这在全党，毛泽东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内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既然是探索，就难免出现失误和曲折。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他主观上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但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独特构想中提出了一些宝贵预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脱离实际的空想成分。而这些空想的东西，又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追求的一种目标，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的失误。

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不是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概貌也并非有人指责的是什么“乌托邦”，只不过在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蓝图中有一些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空想因素。而这些空想的东西由于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使其显得更加完备，更加难以纠正。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之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信中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起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他认为不作这些限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有人认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纲领，它与《五一六通知》（相差几天——笔者注）是姊妹篇：一个主旨在“破”，一个主旨在“立”；一个是“砸烂旧世界”的纲领，一个是“建设新世界”的蓝图，这是有根据的。当年5月15日，指示全文转发全党，要求有步骤地实行。中央在转发的通知中说：“毛泽东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

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正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指示的基本精神又在《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向全国公布。社论高度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是研究了国内外各种经验的产物”，“是反修防修，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科学方案。”不但如此，现在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的设想，是1958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发展，是有历史联系的。因此，《五七指示》所勾画的理想社会蓝图，其要点就是：政治上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要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配上要人人都为公共利益而劳动，不计报酬，大致平等，差别很小；社会分工上各行各业自成体系，自给自足。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而毛泽东却把这种抵制视为党内存在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不仅认为那些不赞成他的错误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中央领导人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断定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思想仍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愿意进行有损于自己既得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他认为要一步一步地实现那些构想，就必须不断革命，扫除前进中的障碍。于是，《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中介，就联系了起来。毛泽东要通过《五一六通知》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贯彻他的那些“继续革命”的理论；而通过“文化大革命”，实行他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又可以达到理想社会的境界。

总之，在领导党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



在全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构想。在正确的宝贵的预见与错误的空想的因素交互支配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由正确到部分错误，由纠正部分错误到犯了更大的错误，以致最后发动和领导了事与愿违的“文化大革命”。正是从他的那套理想模式出发，他不仅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将其视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伟业大事之一。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时多次谈到这一点。习仲勋 1986 年曾说：过去的一大教训，就是“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胡乔木则进一步指出：“文化大革命”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似乎认为，只要靠群众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陆定一曾针对十年浩劫造成的恶果分析说：原因在哪里？是马克思主义不对吗？是共产党不能领导吗？不是的！当然有种种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我们自己马列主义水平太低，加上建设的经验太不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似懂非懂，若明若暗”。上述总结都十分中肯、精当的。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需要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毛泽东的一些错误观点之所以能够形成，党内之所以不能有效地抵制，许多人甚至接受这些观点，既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又有全党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应当承认，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

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党和毛泽东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问题、新困难的时候，又很容易习惯性地照搬民主革命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采取大规模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去处理；而过去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实践，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根据。毛泽东在《五七指示》的结尾中就说：“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少年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有所发展罢了。”可见，毛泽东是把民主革命时期的军事共产主义经验作为规划他理想社会的依据，把局部范围、特殊条件下的做法普及到全局，发展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同时，加上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个别论断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加以引用，甚至发生误解（比如关于消灭社会分工和差别，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关于小生产的理论；关于商品交换等思想），这就既不能解答中国的具体问题，又很容易流于空想。因此，长时期以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系列“左”倾的理论观点和某些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被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人们日益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中。坚持这种认识竟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而对这种认识抱怀疑态度的人，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加上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与个人崇拜的现象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导致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被破坏，使党失去了纠正自己领袖的错误的手段，难以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今天，我们总结历史的教训，绝不应过多地看到客观的历史根源，也不应过多地追究毛泽东的个人责任或品质，而应着

重从主观和客观是否统一的方面、从当时全党思想理论水平的状况中得出有益的启示。“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破产”。恰恰相反，它从反面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曲解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首先是由于理论认识上的错误，从而导致实践上的错误。在错误理论形成一种社会思潮的情况下，即使有少数领导人看到理论指导上的失误，一时间也难以形成扭转局势的强大力量。这就证明，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广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性。正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各级各类干部特别是高级党政领导干部要针对新的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不能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

从指导方针的角度考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又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是由于在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上出现了偏差所致。深刻地认识国情，尤其是认识像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的国情，作出正确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确实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曲折才能逐步理出一个轮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二十多年时间，党对国情的认识存在相当大的盲目性，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总结“文化大革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人们一般都从考察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升级入手，剖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如何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导致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种种恶果。这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

里，我不准备再按上述思路来总结(因为这方面的论述较多)，而是想从考察党和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的方式、方法入手，总结离开经济建设，违背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的教训。

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采用的一种主要领导方式。毫无疑问，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对于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具有十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运动对于造就轰轰烈烈的革命声势，推翻旧政权，破坏旧制度，会起到一种势如破竹、摧枯拉朽、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正如对任何事物、任何问题都不能绝对化、神圣化一样，对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也不能不分时间、条件的不同，固守不变。在一种情况下，政治运动可以起到积极的效果，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它又会转化成一种难以有效实施领导和驾驭的异己力量，破坏性极大。这从50年代后期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令人记忆犹新的政治运动实践中，可以得到佐证。

据有人统计，建国以来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其间自上而下由党和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各种群众性政治运动，大小不下50余次。其中大运动引带出许多小运动，小运动又助长了大运动，可以说运动的车轮滚滚不停。仅“文化大革命”这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中，就有诸如红卫兵运动、大夺权运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斗批改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学理论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等十几次。当然，对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要作具体分析，不应简单地一概加以否定。特别如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大改造运动等，对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确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巩固的条件下，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

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仍然固守过去运用自如的成熟经验，单纯依靠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的领导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必然会走向主观愿望的反面，产生种种弊端。

首先，群众性政治运动的领导方式不仅给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助长了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而且违背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政治任务。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后，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或者说，党的工作重点应该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轨道上来。鉴此，党的八大曾正确地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路线。1957年初，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的讲话中，相应提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在新的情况下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可惜的是，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被此后相继不断的政治运动所打断，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党的领导工作中仍然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仍然把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作为党的领导工作的主要方式。我国50年代后期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几乎都是为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服务的。不仅政治问题要搞运动，学术批评问题也要搞运动，经济建设更是离不开运动，而且每次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要求大批判开路，反对右倾保守，反对给群众泼冷水，在保护群众积极性的名义下干了违背群众意愿的蠢事。同时，许多政治运动的发动由于一哄而起，违背了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开始时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政策界限，从而造成失控状态，乱批乱斗；即使有的运动规定了一些政策界

／为了悲剧不再重演／

限，也由于群众运动的惯性力量，使不少政策规定流于形式，实践中难以贯彻。上述种种，不仅加速了“左”倾错误的发展，造成党内民主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紧张化，打击面的扩大化，而且助长了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心理，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列宁曾说过：“在经济工作中，建设必定更加困难、更加缓慢、更要循序渐进。这是由于经济工作在性质上不同于军事、行政和一般政治工作。这是由于经济工作有特殊的困难和需要更深厚的根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进入社会主义。这一特殊的历史与国情，决定了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经济必然是落后的。因此，中国必须经历一个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建立发达的生产力基础，才能向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迈进。希望靠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为推动力，借群众的一二次冲锋，凭空改变生产关系，一味提高公有化程度，缩小三大差别等办法去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甚至预言很快进入共产主义阶段，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某种程度的空想，造成各方面的巨大损失。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但也不否认在某些环节、某些方面还存在弊端，这就要求改革和完善。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都要围绕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能靠“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破坏性运动去改革和完善。

其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领导方式，强化了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促进了党的组织行政化的发展趋势，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和国家生活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民主革命时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我们党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权力集中的领导体制。建国后，由于没有采取及时的措施加以完